

章开沅 严昌洪 / 主编

近代史学刊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第6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 Z S F D X C B S

近代史学刊

(第6辑)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史学刊. 第 6 辑/章开沅,严昌洪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622-4090-7

I. 近…

II. ①章… ②严…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丛刊

IV. K25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693 号

近代史学刊 第 6 辑

主编:章开沅 严昌洪 ©

责任编辑:高东军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305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16

印张:10.75

版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近代史学刊》编委会

主编

章开沅

执行主编

严昌洪

编辑委员会成员

章开沅	李文海	龚书铎	张海鹏
冯天瑜	郑师渠	钱乘旦	马 敏
严昌洪	罗福惠	朱 英	彭南生

编辑部成员

严昌洪	罗福惠	朱 英	彭南生
刘家峰	许小青	郑成林	

本期责编

郑成林

(本刊实行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

近代史 学刊

第 6 辑

目 录

武汉抗战研究

- 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 严昌洪 (1)
- 战前战后：《陈诚先生书信集》中的武汉抗战 罗福惠 (11)
- 全面抗战初期武汉宗教界抗战活动述评 马 浩 (18)
- 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新论 江满情 (26)

下层社会群体研究

游者无疆

- 近代上海的游民问题处理 阮清华 (33)
- 20 世纪 50 年代武汉娼妓改造述评 郑成林 冯 武 (56)
- 书写者的暴力
- 清季革命、君宪两派论战背景下妓女形象的扭曲 彭 剑 (68)

基督教史研究

- 20 世纪前期东北基督教的本色化 (1900—1931) 徐炳三 (75)
- 基督教大学对世俗化潮流和党化教育的顺应
- 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章 博 (88)

专题研究

- 湖南绅士与晚清教育 许顺富 (99)
- 论 20 世纪 20 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联邦主义的博弈 张继才 (108)
- 以教促政：民国时期山西社会教育模式研究 申国昌 (118)
- 自由与平等
- 20 世纪 50 年代殷海光、夏道平对政经关系的反思 何卓恩 (134)

书评与研究综述

- 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文化、经济与习俗
- 评严昌洪教授新著《20 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魏文享 (142)
-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的开拓之作
- 读魏文享著《中间组织：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有感 夏松涛 (147)
- 近六十年来民国时期考古学研究综述 徐 玲 (152)

ABSTRACT

(162)

湖北“三怪”在武汉抗战前后

内容提要 严立三(严重)、石瑛(石衡青)、张难先(张义痴)三位民国时期的湖北官员被时人视为湖北“三怪”，意思是说他们是性格耿介、脾气古怪的人。他们三人在武汉抗战前后，又一同在湖北省政府共事。本文介绍了他们在此期间在组织应变，实施西迁；开发鄂西，建设抗战基地；以身作则，整肃吏治；采用“重典”，严禁鸦片；维护国共合作，保护共产党人等方面的所作所为，论述了他们为湖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的贡献。本文认为，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的优秀品质和高尚节操更显光辉。

关键词 严立三 石瑛 张难先 湖北“三怪” 武汉抗战

严昌洪

一、湖北“三怪”的出处

所谓湖北“三怪”，是指严立三(严重)、石瑛(石衡青)、张难先(张义痴)三位民国时期的湖北官员，意思是说他们是性格耿介、脾气古怪的人。

“三怪”之名始于1928年。当时张知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三人同在省政府供职，分任民政厅、建设厅、财政厅厅长。他们三位厅官因不阿权贵，不随流俗，洁身自好，我行我素，而且意气相投，关系很好，被人目为“三怪”。又因他们破除积弊、铁面无私而政声远扬，令贪暴震慑，时人亦有称他们为“三杰”者。

对此张难先在《石衡青先生言论集序》中作了说明：

石衡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称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于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于此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衡青大父某习儒术，笃伦常，教授乡里。衡青幼承其训，弱冠列胶庠，登贤书，无科名习气，守常者也。旋留学欧洲若干年，无白人习气，守常者也。乙巳入同盟会为总理所器重，无党人习气，守常者也。归国屡任要职，交游尽显贵，无官僚习气，守常者也。世复震于迂愚之人亦能致通显，号闻人，或又以“三杰”目之。此三人之所以益悲也。^①

这就是说，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中，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人所怪。他们在世人眼里是怎样的“怪”呢？下文仅举少数事例为证。

他们都曾做过大官，但一直坚持“三等车主义”，不仅平时乘火车坐三等车厢，乘轮船坐统舱，而且走马上任，也是轻车简从，不事张扬。1930年，张难先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上任那天，该省高级官员和地方绅士在杭州火车站列队恭迎，他却穿了一身布衣布鞋，带了简单行李，乘坐三等车到杭州，下车后叫了辆人力车，直奔省政府所在地而去，让在车站迎候

^①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的人们扑了个空^①。石瑛于1932年3月出任南京市长。上任之日,他从三等车上走下来,避开在头等车门口欢迎的仪仗队,手拎旧提箱,着布衣布鞋进入市府,得“布衣市长”雅号。新官上任,如此简朴,使官厅上下大吃一惊,虽然认为他们很“怪”,但从此以后不敢怠慢,风气为之一变。

他们都是得到蒋介石重用的人,但对于蒋介石却不是那么唯命是从。1937年初,石瑛再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时,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拿着蒋介石手书的推荐信向他求职,他觉得该人言行举止轻浮自大,善于夸夸其谈,并无真才实学,决定不予录用。他致电蒋介石说:“钧座命我为湖北人民办事,又命我为钧座推荐的人安排官职,这样我就不好办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须选用廉能干练的官员。钧座推荐的人,我认为不合条件,不能安置。”^②他说得有理有据,蒋介石只好作罢。蒋介石任命张难先当自己家乡浙江省的主席,说明蒋对他十分信任,但在任期间,蒋介石电令他委任蒋伯诚为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他竟回电拒绝。蒋介石连电坚持,他只好赴京当面向蒋介石介绍二人劣迹,并称:“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取消了对该二人的提名。^③

他们做官毫不恋栈,能上能下,并不计较荣辱得失。北伐时,严立三任第21师师长,连打胜仗,成为“北伐名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严立三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蒋对他不放心,暗示他离职,他故意说:“我的胃病很厉害,请准我离职休养。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能力很强,可以接替我的职务。”哪知蒋介石顺水推舟,派人到部队宣布严师长因病休养,由副师长陈诚代理,弄得全师哗然,差点引起骚乱。严立三当即出面制止,令部下交出关防,由陈诚接管。全师饷银结余10万多元,他一分不留,全数交出。随后只身乘车去了杭州,脱去军装,换上僧衣,住进了天竺寺。他既谢绝了部属的馈赠,也婉拒前往探视慰问之人。“北伐名将”削发出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得到全国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拿他没办法,又委任他当了湖北省民政厅厅长。由于掌握实权的桂系鄂籍军人集团专横跋扈,他不能一展抱负,便悄悄离职,只身到庐山含鄱岭南麓的太乙村隐居,一去就是十年。他坚持自食其力的生活,自己种菜、砍柴、做饭、洗衣,并用竹管导水入厨房。劳动之外,闭门读书,不过问时事。部属学生要看望,他劝他们不要来;蒋介石两次亲往探视,他都避而不见。^④1932年,张难先的好友范一侠被任命为张的家乡沔阳的县长,那里极端贫困,没有人愿意到那个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范连一个合适的幕僚也找不到。刚从浙江省主席位子上退下来的张难先知道后对范说:“我同汝去,做汝的秘书。”范还以为他开玩笑,说说而已。岂知第二天,张难先携了行李到范一侠住处,一同前往上任。通过张难先的努力,背井离乡的父老乡亲陆续返回,生产自救,地方顿有恢复气象。此事不仅在民间传颂,蒋介石也知道了,对他戏曰:“县长秘书,得无太劳乎?”^⑤1935年4月,日本《朝日新闻》访华代表团抵南京,行政院长汪精卫亲自打电话给石瑛,令市政府科长以上官员齐到机场迎接,不得有误。石瑛以有辱国格,怒不可遏地回答:“我的科长以上职员决不迎接他们的敌人!”放下电话,即下令市政府职员放假,使得“欢迎”举动无法实施。随后义无反顾地打了一个辞呈,愤然辞去市长职务。^⑥

有了这些事,他们“怪人”的名声更是远播。

笔者曾在《张难先的“怪”》一文中指出:“我罗列了张难先的多种‘怪’,他的这些‘怪’,其实都是很好的品质,很好的精神。在社会风气败坏、吏治腐败的情况下,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不苟且从事,特立独行,既爱惜自己的羽毛,又憎恨别人的劣行,保持了一个正直学者

① 欧阳骅:《湖北“三怪”》,见肖志华、严昌洪主编《武汉掌故》,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② 石聿俊:《“民国第一清官”石瑛》,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③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8页。

④ 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⑤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1~522页。

⑥ 贺有年:《石瑛先生爱国主义的几个突出事例》,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的风范和一个廉洁官员的操守。这些品质和精神不仅当时是很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所需要的。”^①他们三人在武汉抗战前后,又一同在湖北省政府共事,为湖北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的优秀品质、高尚节操,更显光辉。

二、湖北“三怪”对抗战的贡献

武汉会战前,湖北省政府曾两度改组:1937年11月,省政府第一次改组,何成浚任省主席,严立三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保安处长,石瑛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张难先为省政府委员;1938年6月湖北省政府再度改组,陈诚任省主席,严立三、石瑛、张难先任省政府委员,严立三兼民政厅厅长。因陈诚在军事方面负有率部抵御日寇进攻武汉之责,省政府日常工作委托严立三代拆代行。193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严立三为湖北省代主席。到1940年8月陈诚回任省主席,中央免去严立三代主席一职,张难先亦辞去省政府委员一职,只有石瑛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到去世。国民党人士承认:“由(民国)二十七年夏到二十九年秋这一段期间,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是严先生代替辞公负责的。”^②

这段时间正是武汉会战前后,他们三人为湖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做了哪些事情呢?

(一)组织应变,实施西迁

在严立三主持下,制定了《非常时期应变方案》,于省会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一一规划,付诸实施。

省政府机关大部分人员按照财政厅、民政厅、秘书处、建设厅、教育厅、保安处的顺序先后迁移到宜昌,只留少数人在武昌处理善后。张难先随大部分人员撤离,作为队伍中唯一的省政府委员一路照应,并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历史教训,批评制止了负责撤退工作的秘书处人员在船中大唱京戏的行为。抵宜昌后,他督饬各厅处职员不得逗留宜昌市内,迅速齐集20里外的省府事先勘定的行署所在地韩家坝办公,自己以身作则,先期前往。他每天视察各厅处及附近村落,防止政府人员有扰民举动。待到石瑛和省府秘书长柳克述等抵达后,立即要求按惯例每星期举行各厅处汇报会,以明了政情,商讨一切,使省政走上正轨。^③严立三留守武昌到10月25日武汉撤守、日军进占前夕才离开。他绕道汉水抵达宜昌后,立即在三游洞主持工作,布置未来战局各种因应事宜,抚辑流亡,抢救青年,抢救物资,至废寝忘食地步。

学校方面采取了联合办学、分散上课的办法。教育厅按照应变预案颁布了省立各级学校疏散办法和全省公私立学校联合设立办法,令武汉地区各小学教师分布各县,以扩充县区小学教育,并指定江陵、随县、宜昌、光化、均县、恩施等地为小学联合分校地址,恩施、均县、郧县、利川、宣恩、长阳、五峰、巴东、建始、房县等地为公私立中等学校联合分校地址^④。联合中学由省府主席兼任校长,实际是严立三代理,学生实行公费,经费从严立三缩编保安部队节省的军饷中开支。人们评价这一举措时说:“这一项紧急的抢救青年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湖北全省一万多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能免于日军的蹂躏,获得继续读书的机会;而且鄂西、鄂北素来被称为文化落后的地区,因为新设立了几十所联中分校,地方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无形中受了那些教师和学生们的影响提高了很多。”^⑤

迁移、抢救国家财产是应变的主要环节,严、石、张三人不敢疏忽。湖北省建设厅负责省属各工厂的迁建,分别迁往陕西、四川、鄂西,恢复生产,支援抗战。湖北省图书馆的大量图

① 严昌洪:《谈谈张难先的“怪”》,载《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1期。

② 《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编印。

③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

④ 《保卫大武汉——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专辑》,载《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3辑。

⑤ 《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编印。

书得以保全,亦赖严、石、张的大力支持。1938年,时任该馆馆长的谈锡恩见日军的飞机天天轰炸,心急如焚,多次向省教育厅说明保存图书的重要性,恳请迅速安全转移。负责西迁的省政府秘书长柳克述等人,对战时保存图书文献看得十分冷淡,百般推诿。谈锡恩只得请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出面,在他们的力争下,省政府才将图书馆列入先行计划:拟将大部分图书先转移至安全地带保存;如形势许可,在宜昌开馆,实在不行再转到恩施去。结果船到宜昌,那里也成了敌机轰炸的重灾区,只好继续西迁恩施。但因“军事紧张,轮船汽车均感缺乏”,“加以峡江水势正恶,入施道路崎岖”,大宗图书搬运不便,暂由木船运至秭归新滩收藏,并曾向路过的流亡青年学生开放。后来见新滩也很危险,谈锡恩便根据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嘱托,在秭归与兴山交界处,觅得敌机、土匪难寻,且无潮湿之岩洞,将中外古籍和西文图书转运收藏,并由专人看守。直到1941年,近10万册图书才由游家河岩洞运到恩施,建设新馆皮藏。严立三在给谈锡恩来函的批复中表扬道:“备悉图书皮藏得所,并于潮湿虫害等项施以防护,俱见忠于职守,措置安详,至为欣慰。”^①

在组织民众疏散方面,严立三于1938年8月12日主持疏散武汉人口谈话会,对于难民证的发放、疏散路线、安全保障、沿途接待、经费问题等,均作了详细安排。疏散过程中出现问题,他都呕心沥血,予以妥善解决。如武汉撤守前夕,组织大批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疏散,以免他们落入日寇手中成为炮灰。有一批车夫拉着车子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宜昌,当地红帮大爷周少武借人力车落脚他的均益车行之机,竟乘人之危,霸占了这些车辆。汉口人力车业同业公会的人写状子向省政府控告,严立三亲自过问此事,批转给宜昌警察局长伍建鹏,伍建鹏令均益车行将车辆、零件和收入的租金全部退还给了原主。^②

陈诚后来在台湾回忆往事,对严立三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说他“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的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③。

(二)开发鄂西,建设抗战基地

省政府迁移到鄂西以后,为坚持持久战,必须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严、石、张三人为此付出很多。在代理省主席严立三的领导下,省政府在鄂西山区,励精图治,倡办合作社,实行“二五”减租,严肃认真地查禁鸦片,打击贩卖毒品,一时蔚为风气。

1938年下半年石瑛与严立三力主恢复难行的旧蜀道,修通了与四川万县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到利川)、与湖南交界的“咸来路”(咸丰至来凤)、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这些道路相对易修建,而且造价低。当时修通的道路,对抗日时期沟通东西南北,保障军民物资供应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建设厅根据严立三的指示在来凤县创办了棉业场,张难先巡视到该县,认为施鹤人民无衣穿已经很久了,棉业场之设实为当务之急,他“遍观该场,并勉励员工努力工作,增加生产,以裕民衣”。当他了解到恩施地区佃农租课奇重,犹存农奴制度遗迹,深有感触,利用出巡各县机会,与各县县长商讨减租事宜,得到县长们的支持后,就在旅途草拟告民众书,并派干训班学员数十人专办减租事务,借以减轻民众负担。^④

石瑛辞去省府委员职务后,移居建始县城,在那里组建棉麻生产合作社与粮食加工合作社,发动当地居民努力生产,支援抗战。据石瑛的儿媳柯蕙荣回忆:“1942年初,(石瑛)在恩

① 《谈锡恩为湖北省西迁图书馆书选择收藏处所问题写给严立三先生的一封信》,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② 武汉市三轮车服务公司编:《人力车三轮车志资料汇编第一篇(1888—1949)》,武汉大学历史系李天松教授所藏1982年稿本。

③ 转引自袁守谦:《严立三先生传》,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④ 李飞鹏:《湖北“三怪”之一的张公难先》,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施龙凤坝创办棉麻纺织合作社,李范一先生主其事。产品以平价出售,或廉价供应军队,或捐赠医院慰劳前方将士。获利抽出一部分津贴小学教师,或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①

1941年,严立三不当代省主席了,连省府委员职务也辞而不就,但他还是向陈诚建议成立了“晒坪垦殖处”,“仍入恩施山区中主持军队屯垦事宜者一年余”^②。他带领保安二团部分官兵三百多人,前往宣恩县椿木营晒坪,开垦荒地几千亩,并畜养生猪、山羊、黄牛等,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以农养兵,减轻老百姓负担。他解释这件事说:“晒坪垦田只是为了辟荒莱而之膏腴的倡导,为政者应当讲求生聚、利用、厚生之道,应不止是‘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襟抱。”^③严立三病逝后,为纪念他的抗日精神,垦殖处官兵根据他生前手迹在晒坪立了一块“不共戴天”碑,至今保存完好。他此前在三游洞题写这四个大字,是为了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恩施地方教育落后,他们三人又尽自己的力量为当地教育事业作贡献。张难先辞职后,在宣恩县长潭河开办了一所成人识字班,其动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惟悯地方农民俱不识字,当办一成人识字班以训盲之”^④。他把住地附近的青年农民组织起来,白天劳动,夜晚学习,参加的有22人。他在开学典礼上说:穷人要读书识字,才不会孤陋寡闻,今后才有出息。他鼓励学员要发奋,立下恒心,常勉之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⑤。严立三辞去政府职务后,则在宣恩鹤峰联合中学担任义务教师,并在教学中以抗日救国的思想对学生进行教育,要求他们发奋学习,随时等待祖国的召唤^⑥。

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在抗战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应归功于严立三、石瑛、张难先的推动和以陈诚为首的湖北省政府的倡导。

(三)以身作则,整肃吏治

如果说严、石、张三人为官清明廉洁,人所共知,毋庸赘述的话,那么他们以身作则,整顿各级机关的作风,却是很值得一提的。

他们三人经常微服到下面各县巡视,对各地官员进行考察,随时予以奖惩。张难先在1937年末出任省府委员后,觉得委员虽然只有会议责任,但战争时期,不能如平时之退食自公,虚与委蛇,于是自动出巡各县。所到之处,坚持“不住衙门,不受招待”两原则,只身寄寓旅店,约谈官员。发现有的精干有为,有的为庸猾俗吏,即一一报省府奖惩。他在家乡沔阳仙桃镇听说区署官员贿释抢犯,便要县长惩治,县长竟袒护不理,张难先立即致电省府逮押区长法办。对于在非常时期意志衰落的官员,则“谕以镇静肆应,无戚戚为也”。对于宜昌等地“江堤及土地陈报合作社等利弊,俱痛切言之,多所纠正”。他在巡视中发现,“此偏僻险要地区,敌不易进”,遂向省府建言:“宜于此时筹划之,以为非常时期准备”^⑦。事实上,后来政府播迁,学校疏散,正得益于前期的整顿。

严立三到宜昌后,也经常乘间更番出巡鄂中、鄂北各县市,解决当地各种矛盾和问题。他到各地视察,也是事先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总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就到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务,不受任何接待。他常常步行到附近各学校、机关,突击检查作息制度执行情况,发现政声不佳、慵懒无为的官员,就命其到省政府听候处理。因此公务人员们改变以往拖沓的陋习,不敢玩忽职守,省府机关很快就出现严肃、紧张的气氛。遇有贪污行为更是严惩不贷。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是严立三亲自选用的人。当他查实朱敲诈一商行法币2000元后,命令第四区专员金

① 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② 梁漱溟:《严立三先生事略》,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③ 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④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

⑤ 涂国元:《关于张难先先生的两段回忆》,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⑥ 黄可兴:《严立三先生在宣恩义务教育的点滴回忆》,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⑦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页。

巨堂将其逮捕解省。金与朱是老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而不执行命令。严立三便亲自派保警队去沙市,将朱鼎钧押解到宜昌交付审判。金巨堂又请保定军校同学江防司令郭忏出面力保,企图借郭忏是湖北省境内最高军事长官的地位,逼迫严立三屈服。严立三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将朱鼎钧法办。

严立三极力贯彻其“官皆将、民皆兵”,“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的主张,很重视干部的轮训和民众的动员。他到恩施后,也开办了省行政干部训练团,亲自兼任团主任。干训团轮流调训省、专署、县的党政军团各级干部。他以不爱钱、不怕死为选拔和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每任命一个县长,总要把对方找来谈话,要求他们做到廉洁,对百姓负责。在其主持下,选拔了许多抗日爱国的人才。

石瑛任省临时参议院议长时,参议员们在其领导下,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政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如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受到副议长胡忠民声色俱厉的斥责。

(四)采用“重典”,严禁鸦片

武汉失守后,日军在沦陷区推行毒化政策,以鸦片、吗啡、白面、红丸等毒品作为诱饵,收买汉奸。后方宜昌、恩施毗邻盛产鸦片的川、黔,长期以来也公开种植鸦片,所以鸦片流毒较广。严立三看到鸦片的严重危害,力主严禁鸦片。他下令公务人员严禁吸食鸦片。1939年春,将吸食鸦片的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处以极刑,引起社会震动。他以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名义,颁布法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但这项法令报告上去,军事委员会执行总监不予批准,行政院不予备案,司法部提出驳斥。严立三一直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通过力争,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默认,使这项法令在湖北得以实施。^①

张难先在鄂西为扩大禁烟宣传,特宴请党政军各机关及民间团体负责人数十人,请他们乘便协助宣传禁烟,并印发图书文告数十万份,分发全省保甲,以资普及。他还亲率本厅职员分赴城乡,开展宣传。“各界人士,亦闻风兴起,竞相发动,声势大振。民众皆知烟毒之为害,而相与禁绝。”^②

石瑛在民国初年就总办过禁烟事宜,曾亲自起草禁烟法规。到恩施以后,看见鄂西种植鸦片,遍地皆是,便利用参议会的平台,建议政府采用“重典”彻底禁烟,使得陈诚回任省主席后,于1940年颁发了《湖北省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又以省主席名义发出:“酉感保民代电”,严令各县“对禁烟要政,决全力执行。无论种、运、吸、售一概严禁,如有违犯者,公务人员立处死刑,人民宽限至本年十二月底前一律戒绝。如仍不觉悟,视为有意玩法。从三十年(1941年)一月一日起,概予执行枪决,不稍宽假”^③。

(五)维护国共合作,保护共产党人

抗战期间,即使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打压。所以许多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共产党人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的危险。严、石、张三人是真诚的爱国者,他们对于共产党人的抗战行动是支持的,对于国民党破坏合作的行为是反对的。他们常常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维护国共合作,保护共产党人。

严立三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对于地方官员与中共的合作持默许或支持的态度。如武汉沦陷后,汉阳县长陈绳武、汉川县长龚熏南等曾一度与中共合作,将中共所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编为县政府的中队,仍由中共领导,保持独立性,粮饷则由县政府供给。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得到严立三的许可,两位县长是不敢做主的。省政府撤退至鄂西,驻鄂西的中

① 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② 李飞鹏:《湖北“三怪”之一的张公难先》,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③ 庞道斌:《崇阳查禁鸦片烟馆及吸食鸦片的情况》,载《崇阳文史》1990年第8辑。

统、军统特务机关经常向上级打小报告,攻击严立三对中共在地方上的活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并向严立三提供一些有关中共活动的情报,借以施加压力,逼他采取打压行动,但严立三仍然置之不理。严立三任用的县长,有些人受到他的影响,与中共保持合作关系,如监利县长郑桓武与中共党员韩白起、萧抱真等约10人的小组合作领导抗日。郑桓武和五峰县长章致铨、石首县长刘儒等,都受到中统、军统的多方攻击,被指责为有共党嫌疑,要求严立三予以撤职查办。严立三为了保全他们,顶住各方责难,多方予以维护,有时竟到煞费苦心的地步。^①

石瑛更是与共产党人公开合作,以为建设厅培训合作干部的名义开办了汤池训练班,实际培训的是开展抗日游击战的骨干。建设厅给名义,给经费,并委任前厅长李范一为训练班主任,但主持训练的是董必武指派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陶铸等人。陶铸他们不仅训练学员的游击战术,还给学员上政治课,教给其发动群众抗日的理论和方法。训练班一共办了4期,培养了几百名抗战骨干。训练班办得很有生气,引起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感,他们说“共产党打入训练班,应城红了半边天”,什么“共产党乘机扩充势力”等等,肆意攻击石瑛。石瑛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什么红了半边天,现在是国共合作,你救国就不许别人救国吗?”“我宁可受制于中共,也不屈于日本人。中共是中国人嘛。”^②

1939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时,陈诚也在恩施设立各种针对“异党”的特务机构,使鄂西地区中共的一些组织遭受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遭到搜捕,恩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石克己曾以石瑛“侄儿”自称,以便掩护革命活动,得到石瑛默许。石瑛听说石克己被特务拘捕,而且身患重病,便以参议长的身份匆匆去找陈诚要人。当陈诚说“石克己是共党要犯”时,石瑛高声嚷道:“我拿人头给他担保!他要真是共产党,跑了砍我的头。”陈诚面对这位国民党元老,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让石瑛把他保外就医。石瑛派专人为石克己治疗、护理,日夜不停。石克己病故后,征得严立三的同意,有关方面为石克己遗孀尤怀青安排了工作,以解决其全家的生活困难。他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多名共产党人脱离险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③ 陈诚对石瑛多方庇护共产党人不满,在省议会上对石瑛进行试探,问石瑛:“恩施中共地下活动频繁,石老先生看如何处理为宜?”石瑛慨然道:“胡宗铎、陶钧在湖北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使湖北元气大伤。希望辞修主席以保存湖北元气为宜!”

严、石、张三人在抗战期间的劳绩,恩施人民予以充分肯定:“石瑛同严立三、张难先‘三杰’不仅在开发鄂西、整肃吏治、振兴教育诸方面极有建树,而且极力拥护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日的主张,并且在保护进步青年,支持、掩护我地下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方面,竭尽全力,做了大量为世人称道的工作。”^④

三、湖北“三怪”的结局

抗战期间的湖北省政府中,存在着严、石、张与陈诚及其亲信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影响到“三怪”的结局。

1938年6月,蒋介石改组湖北省政府后,作为湖北省主席的陈诚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忙于军事,无暇兼顾省务,省主席由严立三代理。湖南长沙人柳克述任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这位柳克述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著有《土耳其革命史》、《不平等条约概论》等著作。后投身国民党军政界,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军事委

① 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② 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③ 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④ 李长荣:《鄂西地下党在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载《恩施文史资料》1997年第8辑。

员会政治部秘书长。他是陈诚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省政府里以陈诚的实际代理人自居,对代理省主席严立三处处掣肘,使严立三不能有所作为。他的一些做法也令张难先、石瑛不满。

柳克述与张、石二人的摩擦激化是在省政府迁到宜昌以后。省政府西迁时,张难先是随大部队先到宜昌的,秘书长柳克述后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张难先要求柳克述召集各厅处负责人商讨进行事宜。柳克述回答说:“都曾与我见面者,开会委员不足人数。”张难先说:“在省每星期举行会报,厅长无暇出席者,派科秘列席。此处应赓续此会,以明了各厅处之政情,并商讨一切。”在张难先的一再要求下,柳克述才召集省府办公会议。张难先认为柳克述不愿开会,是想借此机会专擅,“甚不欲有此举动,以碍其弄权也”。^① 柳克述专擅弄权之事,主要表现在安韩公路建设上。

安韩公路是宜昌河西安安庙至省政府所在地韩家坝的公路。自省府决定迁韩家坝时,已派人会同宜昌地方官员组织民众修筑了一条人行大道,长约20里,宽丈余,手车、肩舆俱可通行,张难先等以为改善一下或稍为整理即可供省府人员来往。但柳克述等人为了方便自己可乘汽车由宜昌前往韩家坝办公,在未列入办公会议讨论案的情况下,私下决定将此路扩充为可通行汽车的公路。柳克述和建设厅厅长郑家俊擅用省政府名义发号施令,征用民工五六万,大兴土木,强征工料,限期很急,造成群众不满。张难先通过外间舆论得知政府对于安韩公路将大兴土木后,认为问题严重,才与石瑛开始注意此事。在9月28日会报时,张与石两位省府委员把安韩公路问题提出讨论,柳克述则支吾其词,终决议为仅整理安安庙至偏岩子之人行道(约五六华里),不建汽车路。岂知10月5日,《武汉日报》载有宜昌第一区奉令重修安韩公路,需工五六万。县府、区署拟派员前往各乡督催征工等语,张与石极感诧异,同赴省府质问柳克述。柳则狡词搪塞,谓此系报馆错误,答应去信嘱其更正。两天后,《武汉日报》果然刊载省府来函照登一条,称安韩公路最近只零星修补,并无征工五六万大举重修之计划。张难先与石瑛以为确系记者讹传。次日来客告知公路仍在大力抢修,甚至拉来许多妇孺,叫苦不堪。两人惊讶之余,于10月9日亲往施工现场勘察,才知柳克述称无此事都是欺蒙之言。于是查阅文件,乃知柳于9月29日已用府令,催李专员转饬宜昌县长,迅即征工六万一千名,星夜赶筑。28日会报记录中,秘书处已将当时商决“不建汽车路”一句删去了。张、石二人见柳克述欲摆其非汽车不坐之架子,致劳民伤财而不恤,十分愤怒。他们致函陈诚、严立三,揭露柳克述盗窃职权、劳民伤财种种恶劣行径,同时提出辞职。^②

严立三到宜昌时,石瑛、张难先已经先往建始、恩施去了。此时,湖北大片土地已相继沦陷,警报频传,人心动荡,时局岌岌,使严焦头烂额,失去张、石臂助,更觉孤掌难鸣。到1939年初,感到无法打开僵局,与张、石反复磋商,决定辞职求退。经蒋介石挽留,并正式任命严立三为代理省主席,才勉强支撑。但陈诚的省主席职并未开缺,严立三作为代主席兼建设厅厅长,张难先作为委员兼民政厅厅长,仍继续处于左支右绌的困境。到1940年秋,陈诚回任省主席,严立三、张难先乃挂冠而去,连省政府委员也不当了。

石瑛辞职后,曾卜居建始县一段时间。1939年9月被选为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所主持的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除了前面提到的弹劾朱一成,斥责徐司令外,有一次对陈诚的质询甚至引发了“政府危机”。参议会在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的同时,对省政府也进行严格的监督。一部大型机器从武汉撤退至宜昌时运至万县搁置,而撤退到恩施的省府又等着急用,负责运机器的人却坐视不理,并想乘机拍卖发国难财。省临时参议会为了弄清真相,照章通知省主席陈诚到会答复。陈未至,派来的代表经议员几番追查质询,答复均不得要领。参议会因而督促陈诚亲临面复,搞得陈诚很难堪,大为激愤,但对石瑛不敢发作,竟以辞职相要挟。石瑛则立即提出辞职以相对抗,双方坚持不下。最后还是陈诚登门拜访石瑛,当面疏通意见;石瑛也看到“府会之争”形成僵局,必对抗日

^①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

^② 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563页。

救国的大局不利,就由省参议会通过“挽留陈主席”的“决议”,而体面地结束了这场“政府危机”。^①

1943年,陈诚调离恩施,由陈诚系的民政厅长朱怀冰代行省主席职务,朱还兼任省粮政局长。一次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会议上,朱怀冰作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质询。议员们所揭发的各地粮政弊端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很严重,朱怀冰竟推卸责任地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这时,正患严重风湿关节炎,站立、步行都很困难的石瑛猛然把桌子一拍,从议长席位上站起来大吼道:“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搞得朱怀冰下不了台、无地自容。副议长胡忠民赶紧站出来转圜,宣布暂时休会,朱怀冰才灰溜溜地走下台来。不久,朱怀冰的粮政局长职务由上面派来的王冠吾接任。^②

湖北“三怪”的“怪”脾气,使他们在省政府中遇到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愤起而争,其结果却往往是自己愤而辞职,辞职以后又过着贫困拮据的生活。石瑛、严立三因病早逝,只有张难先勉力支撑,到恩施、宣恩过了一段时间艰难的隐居生活,直到1942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情况才有所好转。他后来见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为新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石瑛于1943年12月4日病逝于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关于其死因,著名学者吴相湘说:“民国卅二年春,石力疾主持临时参议会会议历十余日,会毕而足部痿痹。自是日就衰损,是年七月,就医重庆中央医院,终告不治。”^③石瑛儿媳柯蕙荣认为其公公本来身体魁梧,体质强健,可是由于生活过于艰苦,工作又很繁重,终以劳瘁致疾^④。

生活艰苦,对于严、石、张三人来说是有共性的。

克制物欲,不以个人私事耗费一文公帑,是严立三一生做人的根本精神。陈诚回任省主席后,本来严立三仍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但他坚辞不就,不领委员薪金,不参加省府例会,结余下来的经费一文不取,带着部分保安部队官兵在宣恩长潭河晒坪垦荒。他两袖清风,一贫如洗,甚至连衣食都不周全,厨房里什么都没有,经常是就着豆腐乳喝稀饭,别人送米送柴也不收。带病到宣鹤联中义务教书,校长炒两个鸡蛋留他吃饭也被谢绝。他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1944年4月30日去世,终年才52岁。陈诚在其《石叟丛书》中追忆严立三一生时说:“综观他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⑤

由于1937年底至1940年8月期间,严、石、张“三怪”或“三杰”俱在湖北省政府任职,时人誉之为“贤人政府”^⑥。但由于他们的“怪”脾气,先后辞职离开省政府,未能将“贤人政府”延续下去,更未能一展自己的抱负。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他们的“怪”性格与当时官场的普遍宿弊之间的冲突。尽管是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场上仍然存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和无作为、乱作为等弊病,而三位贤人洁身自好,不随流俗,而且疾恶如仇,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遇到像柳克述那样的官员,他们与之斗争的过程往往是“决议违反,只有质问。质问欺骗,只有辞职”。当时的官场上难以容纳下他们这样的正直之士,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其结局往往是悲壮的失败。

二是他们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与国民党部分官员破坏团结抗战的冲突。尽管是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国民党内一部分官员仍然把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共产党人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严、石、张三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支持共产党人的抗战,维护国

① 石聿俊:《“民国第一清官”石瑛》,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② 石聿俊:《“民国第一清官”石瑛》,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

③ 吴相湘:《“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石瑛》,载《湖北文献》(台北)1974年第30期。

④ 柯蕙荣:《我的公公石瑛先生》,载《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

⑤ 转引自欧阳骅:《湖北“三怪”》,见肖志华、严昌洪主编《武汉掌故》,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⑥ 王俊杰:《龙洞河走笔》,http://www.enshi.cn/20071128/cal10216.htm,2008年10月20日。

共合作局面,因此与国民党反共势力时起冲突,他们本身也受到威胁。

三是他们与陈诚及其亲信在省政府内的权力冲突。陈诚虽然忙于军务,将省政府事务交给严立三“代拆代行”,后来由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严立三为代理省主席,但是陈诚并不放心,在省府中安插了像柳克述那样的一些亲信。这些人以陈诚在省府中的代理人自居,掣肘和越权之事时有发生。严、石、张三人在应付日寇飞机轰炸的同时,还得应付这些人的明枪暗箭,所以显得左支右绌,不能按自己的意图施展抱负。只是为了抗战需要,他们才在省府中勉力维持。后来陈诚回任,有了主事之人,所以严、张同时辞职,只有石瑛在临时参议院中坚持斗争到最后息。

虽然他们没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作的努力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贤人政府”在严立三带领下大概存在了两年十个月,有人对严立三评价说:“当军书旁午,政府播迁,人民流离之际,虽有率以正、拯其弊之夙愿,终以无法形成一世之风尚,以挽回已坠之颓习,这是深可惋惜的。然先生所至之处,仍具有如唐杨绾为相、郭子仪为之减声乐之风裁,同僚中人,往往敬惮之;学生部属,直接受其感化力,颇能发生风偃于下之影响。”^①我们认为这一评价对于石瑛、张难先二人同样适用。

(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① 袁守谦:《严立三先生传》,载《湖北文献》(台北)1981年第58期。

战前战后：《陈诚先生书信集》中的武汉抗战

内容提要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诚即认为中日之战不可避免。故尔他早下决心，并不断催促中央切实准备，而反对“秘密外交”和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从1936年起，陈诚参与了对日侵略作“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制定，并在战场测定以及确定湘鄂赣为“全面作战中枢”和“国防上之根据地”等问题上，体现出他的战略眼光。武汉保卫战是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战斗结果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武汉保卫战之后，陈诚对自己和第九战区参战将领的功过作了反省和评论，其中虽难免受到官场潜规则的制约，但他本人勇于承担责任，如实反映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的严重问题，体现出高级指挥员严明赏罚的正确态度；尤其是强调民众的支持为“今后胜败关键”和“广大的空间则是让我们获胜的原因的原因”这两点，体现出陈诚重视民众的立场和热爱祖国的精神。

关键词 陈诚 书信集 蒋介石 武汉抗战

罗福惠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就启动了对陈诚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各类文章已有数十篇之多。其中江苏的孙宅巍，湖北的田子渝、曾成贵、李良明等人，都已发表过有很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对陈诚与武汉保卫战、陈诚主政湖北、陈诚与国共合作、陈诚与江西“剿共”等，作了深入研究。他们所根据的史料，早期主要是《新华日报》、《陈诚私人回忆资料》、第二档案馆所藏和台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陈诚与蒋介石的往来电文，较新的则是2006年7月台北“国史馆”所出的《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以下简称《家书》）。本文则拟主要利用2007年12月台北“国史馆”出版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以下正文和注释均简称《函电》，以与《家书》相区别），对“陈诚与武汉抗战”问题作若干补充研究。

一、决心、经验、战斗谋划

“九一八”事变甫发生，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陈诚即在21、22、23日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对日宣战，并表示“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①。由于蒋介石仅答以“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态度，务须避免轨外行动，免为反动所乘机，至滋口实，贻害大局”^②，陈诚在24日又发出长电，指出中国“历年变乱不已……无一非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之所致。是不直接打倒帝国主义，而日事讨逆剿匪，乃舍本逐末；其谓须先求国内之统一，肃清一切反动，而后始能打倒帝国主义者，适倒因为果也”。陈诚认为日本“久有计划”吞灭中国，故中国的危机“绝非时下之秘密外交所能消弭。我政府自二次北伐后，对帝国主义低声屈服，士气日就消沉，民众离政府亦日远，因此变乱相寻，民不堪命”。如果能“举全力对帝国

① 《电呈请缨抗日》，见《函电》上册，第60页。

② 《手谕团结对日以免贻害大局》，见《函电》上册，第61页。